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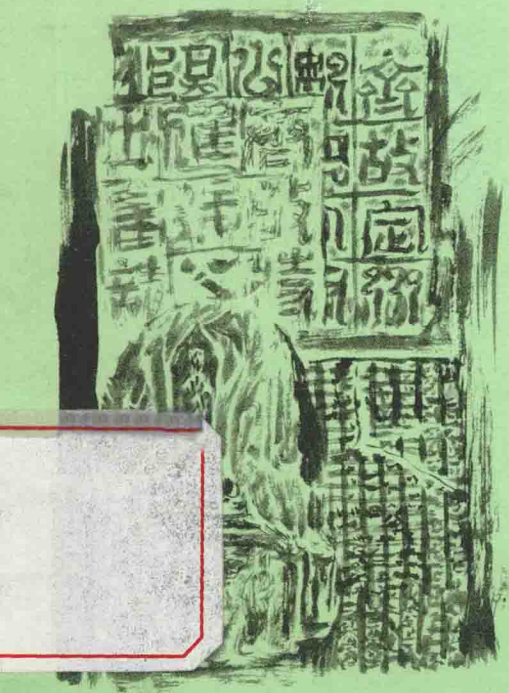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二十七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山西碑碣墓志铭概览

杨子荣
著

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,云冈石窟、天龙山石窟,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的大量的经幢、石幢、造像碑等刻石,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轨迹。本书从汉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分三部分概览山西古代碑碣墓志铭文化。



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熔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严果生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27辑)

山西碑碣墓志铭概览

杨子荣 著

※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※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7.75 字数:300千字

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※

ISBN 978-7-900434-97-5
G·115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杨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钟声扬	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士星
郭双威	郭维明	高 可	高专诚	陶正刚
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	谢 恺	董永刚
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	雷忠勤	霍润德

录

引 子	.. (1)
一、山西古代碑碣墓志铭简述	· (3)
二、山西现存重要的碑碣	· (9)
三、山西现存重要的墓志铭	(50)

引 子

凡是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、碣、造像碑、经幢、石幢、摩崖题记、墓志铭、画像石等统称石刻，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石刻，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。狭义的理解，专指“碑”；广义的理解，包括碑、墓志、造像碑等各类刻石。

所谓“碑”，汉以前就有了。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，而是立于宗庙、学校，用以观日影、记时刻、测方向的。古代礼仪规定，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。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系于碑。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，是立于墓前用于下葬，称为“窆石”，下棺时作为辘轳。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，称之为“碑穿”，用以系绳下棺。因此，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，而是实用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碑”，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。原来在西汉以前，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，西汉开始以石代金，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。这即是金石铭文学的由来。

从西汉“碑”开始镌刻文字以来，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，均由碑身、碑首、碑座三部分组成。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。碑头有圭首、圆首、平首、梯首、冠形首、螭首等。碑身以长方形为多，另有倒瓶形、六棱、八棱形、正方柱形、扁方形等。碑座有龟趺形，形状较庄重也最多。古人以

龟为长久，常常以龟背碑（实际称鼃屾）。碑的内容有功德碑，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；庙碑，种类繁多，记述庙的修建历史；墓碑，记载死者籍贯、世系、事迹及卒葬时间等。还有记事碑、纪念碑、文告碑、诗文碑等。

从现代广义上讲，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，而在先秦时除“碑”以外，其他都不称碑，而称“刻石”，也称“碣”，是利用自然石头或石壁上刻铭，不做任何加工。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《小臣系□》和一些石磬刻字。以后有秦石鼓文、秦始皇峰山、泰山、琅琊台刻石等。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。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，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。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，云冈石窟、天龙山石窟，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、石幢、造像碑等刻石，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。另外，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，起源于汉代，形制为长方形。而标准方形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，大盛于唐，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碑碣墓志铭最大的特点，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，被称为“石史”。它最大的功用，是可以证史、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，在弘扬民族文化，借鉴历史经验，为社会主义政治、物质、社会 and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例如，山西现存1.8万多处古建筑，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文献记载都较简单，多数只一句话，或者查不到任何记载。而这些建筑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，主要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，因而各个古建筑中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佐证。再例如，山西历史上的灾荒

不断,如元大德七年(1303)平阳、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一次地震;清光绪三年(1877)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,连续三年颗粒无收,死亡百姓不计其数,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这些灾荒,由于历史的原因(如信息不畅),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,有意隐瞒,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,也有不少灾荒无记载。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,使后人永志不忘。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历次战火,或被人为破坏,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,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、水旱灾害等灾荒的宝贵资料。除灾荒碑外,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,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、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。汾阳市出土的《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铭并序》解开了多年来“汾阳”称谓的谜团。总之,碑碣墓志的作用,是其他文献代替不了的。

下面分三部分概览山西古代碑碣墓志铭:

一、山西古代碑碣墓志铭简述(含著录);

二、山西现存重要的碑碣(含摩崖题记及佚存的汉魏两晋碑);

三、山西现存重要的墓志铭。

二、三部分均不分域分类,按时代顺序排列。

本书上限自汉代,下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一、山西古代碑碣墓志铭简述

自西汉开始以石代金,出现刻铭的记事碑、功德碑以

来,山西历代碑碣墓志铭分域一直是全国的一个重点省份,其大量历史、书法艺术、科学价值颇高的碑碣墓志铭受到金石学家和石刻爱好者的青睐。特别是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,访求山西碑碣墓志铭成为历代众多史学家、方志学家、文化学家们终生爱好和一生的追求。

山西历史上最多时究竟有多少碑刻,谁也说不准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,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通件左右。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《语石》中说:“大抵晋碑皆萃于蒲、绛、泽、潞四属。绛州以闻喜为盛,泽州以凤台为盛,蒲州以永济、虞乡为盛;潞安以长子、屯留为盛。”四属原都称州,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、临汾、晋城、长治四市,即山西南部地区。《山右石刻丛编》收录的720余通碑刻,属于上述四州的496通,占全省的68.9%;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,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,占全省的64%;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,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,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。但除上述四州(四市)外,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,其中不乏有精品,同样应予以重视。

山西碑碣墓志铭有如下五方面的特点:

一是数量多。如上所述,现存两刀通(件)左右,位居全国前茅。

二是自西汉出现记事碑以来,历代都有大量存世的碑碣墓志铭,时代连续,从未中断,并代有珍品。山西并不是没有汉碑,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就收录汉碑15通,魏晋碑18通,但这些碑石都毁于历史的变故之中。1976年临猗县翟

村东汉丞相翟方进墓出土的建宁元年(168)残石(董寿平先生鉴定是碑是志,难以确定,故定名“建宁残石”),以及垣曲县五福涧村黄河右栈道发现的东汉建武十一年(35)摩崖“遣修栈道题记”、盐湖区中条山矿洞崖刻“光和二年(179)”、“中平二年(185)”、“甲子”、“甘露”、“平阳司马胡生”等汉代题记、夏县王村汉墓出土的“安定太守裴将军碑”残石,万荣县荣洞镇汉墓出土的“冯子翼作”的砖刻题名等,弥补了“山右无汉刻”的空白。

三是名碑多,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全国书法艺术参考名碑中,有山西的15通(迄今只公布过这一批)。山西名碑中在全国较有影响的,有北朝的霍扬碑(临猗)、齐太公庙碑(芮城)、曹恪碑(省艺术博物馆)、程哲碑(省艺术博物馆)、文成帝《南巡碑》(灵丘)、裴鸿碑(闻喜);隋代的有陈茂碑(临猗)、栖严寺舍利道场碑(永济);唐代的有李世民《晋祠之铭并序》(太原)、裴镜民碑(闻喜)、裴光庭碑敕(闻喜)、碧落碑(新绛)、铁弥勒像碑(交城)、李光进、李良臣、李光颜碑(榆次,称“三李”碑,其中李良臣碑毁);宋代的《萧墙碑》(万荣)、《杏花碑》(夏县);明代的司马光神道碑;清代祁寯藻书丹的《平淮西碑》(闻喜)、五台山等地清代帝王御制御书碑、傅山摹刻的《郭泰碑》等等。

四是山西的墓志铭自南北朝定形(方形)以来,代有精品迭出。如北魏的司马金龙、封和宠、辛祥、宋绍祖、姬辰墓志;北齐的张肃、裴良、库狄回洛、娄睿、韩裔、徐显秀墓志;东魏的刘懿墓志;隋代的斛律彻、梅渊、虞弘墓志;唐代晋王、薛徽墓志,以及长治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和100余

方武则天时期的墓志(均有武周时期造的字)等,不仅为地方史志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,而且件件都是珍贵的书法艺术品。

五是山西现存碑碣中,以明清的居多,早期的即元代以前的占近1/10,不到2000通(件)。

北宋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,在其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金石学著作《金石录》中,收录山西碑碣45种(只有碑目,无文),其中汉碑5种:有汉光和二年(179)12月《刘寻禹庙碑》、光和四年(181)闰9月《扬州刺史敬使君碑》汉《禹庙碑》《禹庙碑阴》《豫州刺史贾逵碑》。这5种汉碑已不存世。还收录北朝2种;隋代2种,其中蒲州府(今永济市)仁寿二年(602)《栖严道场舍利塔碑》仍存在;唐35种,其中存世的有裴镜民碑(闻喜),晋祠铭(太原)、碧落碑(新绛)等;五代1种。

山西碑碣墓志铭著录主要在明清两代。明成化十年(1474)始创《山西通志》时,就收录了金石资料。还有明代胡鉴的《山西碑目》。清代有王昶的《金石萃编》、《金石萃编补正》和《金石萃编未刻稿》,共收录山西的碑碣29种(全文),其中汉1种《郭泰碑》已不存世;南北朝2种;唐12种,其中存在的有裴光庭碑(闻喜),铁弥勒像碑(交城)、李光进、李光颜碑(榆次)等;五代2种;宋代5种;辽金1种;元6种。

夏宝进的《山右金石录》,顾燮光的《山右访碑记》、孙衍贵的《山右金石纪略》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(单行本称《山右金石记》)等,都是清代山西碑碣墓志铭的重要著述。其中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是这

个时期访求、研究山西碑刻的代表作，至今仍有一定影响。

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由清光绪时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，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出版，共40卷，收录北魏正光四年(523)至元代至正二十七年(1367)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碑碣墓志铭等石刻724通(件)。其中北朝28通(件)，隋唐五代135通(件)、宋辽金272通(件)、元代277通(件)、不明地域的12通(件)。均全文收录，但只收录了当时存世的，佚存的不收。198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，全6册。胡聘之在序言中概括叙述了编纂过程，他说：“始余官晋藩，即有纂辑之志，迁延未果。光绪乙未(二十一年)调任晋抚(升任山西巡抚)。今江安粮道、成都胡君延时为绛县令(绛县令胡延时，成都人)，尝就所得晋刻手录原文，成考证八卷(胡将手抄山西碑刻的原文，编成八卷)。丙申(光绪二十二年)调居幕府(由县令调巡抚部下)，以所著求正于余，因请设局编纂，而以总纂自任。余深韪之(韪，过失，不对)，于是檄通(下令)省、州、县各拓境内碑刻而输之局(将拓片送省)。数月之间，居然毕致。复委山西通判、江宁(人)吴君廷燮并其兄、陕西知县廷觴，与胡君(延时)分代考证。始于丙申(光绪二十二年)之秋，至戊戌(二十四年)夏日而全书成。每成一篇，余必详为考覆复虑，或有舛漏，录副邮致金陵(将错误遗漏的记录下来邮至南京)，乞江阴(人)缪筱珊编修，覆加釐订。筱珊邃于金石之学，又为补辑若干条，邮筒商榷再三，始付剞劂(刻书)。”

从胡聘之的这段序言可以看出，他早有志编纂山右石刻，但因忙于公务，一直拖延办不成。当胡延时向他请教手

抄的晋刻原文时，与他的想法一拍即合，于是“设局”编纂，并自任总纂，不到两年的时间即告完成，够快得了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胡延时已有八卷晋刻手抄本，本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印即可成书。但他深感“黠之”，怕延时手抄本有误，将来会造成什么过失，故他下令，让各州、县送拓片，没用延时的手抄本。州、县送来的拓片，他也不是不加考证地一律使用，而是组织山西通判等3人一件一件地考证真伪，然后由他再详为考覆。还深怕有误，最后还请缪筱珊把关。胡聘之在学术上的这种严谨态度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
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由杨笃(秋湄)主编。杨笃(1834—1894)，字雅利，号巩同，又号秋湄。山西乡宁人，晚清山西著名的方志学家。该记收录汉至元晋刻1 550余通(件)，仅碑目，无文。其中两汉15通(件)，三国两晋(含十六国)18通(件)，北朝76通(件)、隋唐五代422通(件)，宋至元1 000多通(件)。两汉、魏晋的33通碑刻在杨笃编纂《金石记》以前就全部毁之不存。有32通是毁于北周武帝宇文邕二次灭法(第一次是北魏)，当时唯有东汉蔡邕撰文的《郭泰碑》幸免于难。到明代，《郭泰碑》也被盗卖山东济宁，“自是太行以西，潼蒲以东无汉刻矣。”(叶昌炽《语石》)。

另外，夏宝进的《山右金石录》收录山西碑碣102种(只碑目，无文)，也是研究山西碑碣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二、山西现存重要的碑碣

(一) 汉魏晋

〔五福涧村汉代栈道摩崖题记〕 东汉建武十一年(35)十二月刻。刻石面积高0.44米,广0.20米,汉隶。文为“官遣匠师专治之石”。此题记为汉代开凿黄河漕运之佐证。

〔洞沟矿洞摩崖题记〕 位于运城市西姚乡义同村南中条山中。东汉光和二年(179)、中平二年(185)刻。题记内容证明此地当时是采铜、炼铜之地。题记共5行,除上述两个纪年外,并有“甲子露”(相当于中平元年)、“甘露”(属于魏末年)、“平阳□里司马胡生”。司马胡生系题记者姓名。

〔建宁残石〕 1976年临猗县城关镇翟村汉丞相翟方进墓出土。残高0.65米,宽0.45米,厚0.15米。该石刻立于东汉建宁元年(168)。现石已残,呈不规则状,仅残存50余字,以汉隶写成,书法雄古奇逸,参差朴拙。东汉桓帝、灵帝时期是汉隶发展的鼎盛时期,故此碑字数虽残存不多,但对于研究汉隶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演变有重要价值。特别是该石的出土,推翻了自清代以来流传所谓山西没有汉代刻石的说法,更显现出该石的重要。现存河东博物馆。

为了便于查阅,现将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等收录的两汉、魏晋时期佚存的碑碣抄录如下:

两汉

1. 吕梁碑,西汉武帝刘彻元封元年(前110),永宁州(今

吕梁市)。

2. 汉文歆碑, 西汉武帝刘彻元光四年(前131), 绛州(今新绛县)。

3. 明公祠碑, 东汉顺帝刘保汉安二年(143), 解州(今属盐湖区)。

4. 河东地界石记, 东汉桓帝刘志延熹四年(161), 蒲州府(今永济市)。

5. 郭有道(郭泰)碑, 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二年(169), 介休县(今介休市)。

6. 禹庙碑, 东汉灵帝刘宏光和二年(179)河津县(今河津市)。

7. 冀州地界碑, 东汉灵帝刘宏光和四年(181), 浑源州(今浑源县)。

8. 扬州刺史敬君碑, 东汉灵帝刘宏光和四年(181), 临汾县(今临汾市尧都区)。

9. 尧庙碑, 汉, 临汾县(今临汾市尧都区)。

10. 首山复民碑, 汉, 永济县(今永济市)。

11. 首山复户姓名碑, 汉, 永济县(今永济市)。

12. 禹庙碑及阴, 汉, 河津县(今河津市)。

13. 禹庙别碑, 汉, 河津县(今河津市)。

14. 太守樊演碑, 汉, 临晋县(今临猗县)。

15. 宋子浚碑, 东汉, 介休县(今介休市)。

魏晋(十六国)

1. 并州刺史王恒碑, 魏, 太原县(今太原市晋源区)。

2. 豫州刺史贾逵碑, 魏, 曲沃县。

3. 上党太守冯勅碑，魏，潞安府(今长治市)。

4. 都督陆严碑，魏，潞安府(今长治市)。

5. 魏高扬侯母邱舆碑，魏，闻喜县。

6. 魏阌乡敬侯卫颢岂碑阴，魏，猗氏县(今临猗县)。

7. 五户将军祠铭，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(267)，平陆县。

8. 勾注碑，西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元年(275)，代州(今代县)。

9. 西河繆王司马斌碑，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(280—289)，汾州府(今汾阳市)。

10. 天渊池石铭，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六年(296)，大同府(今大同市)。

11. 太原成王司马辅碑，西晋，太原县(今太原市晋源区)。

12. 榆次令荀藐碑，西晋，榆次县(今榆次区)。

13. 晋安邑令徐君碑，西晋，安邑县(今盐湖区)。

14. 中书令裴楷墓碑，西晋，绛县。

15. 北汉司徒刘雄碑，十六国汉刘聪嘉平五年(315)，临汾县(今尧都区)。

16. 猗秦太公庙碑，十六国后秦姚兴弘始十六年(414)，芮城县。

17. 十六国后赵石虎建武中碑(335—348)。地址不详。

18. 后赵将军张平碑，十六国后赵，五台县。

(二) 北朝

〔密云太守霍扬碑〕 北魏景明五年(504)刻立。原在临

猗县临晋镇,1986年移至临猗县博物馆收藏。高2米,宽0.96米,厚0.20米。双螭头圆形碑首,龟趺座后配。中间阴线刻释迦坐像,其下有一圆穿。两侧刻篆书《密云太守霍扬之碑》。碑文17行,满行27字。碑阴文字风化严重,只有少数字可以辨识。据碑文记:霍扬,字荣祖,河东猗氏(今临猗县)人。先祖是周文王子霍叔处,被封霍侯(今山西省霍州)。西汉大司马霍光是其嫡祖先。其祖辈数代均入仕途。霍扬秉承家教,博学多才,南朝刘宋封龙骧将军,后归于魏,封振武将军,官至密云(今北京密云县)太守。该碑撰书人姓名不详,但由于刻立在魏碑的鼎盛时期,故凝聚了魏体书法精华。1979年,该碑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书法艺术名碑。

〔“开锡记”摩崖题记〕 位于平陆县坡底乡西尤沟甘山下东麓处。北魏永安二年(533)刻。文题“开锡记”3字。据考,此处为锡矿遗址。

〔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〕 北魏。原位于山西省灵丘县东南约15公里处的河阶台地上,现残碑及碑座存灵丘县觉山寺。该碑为螭首龟趺,碑首顶为弧形,宽1.45米,厚0.30米,最宽处比碑身宽约0.08米。在顶端雕刻四龙,阳面两条,阴面两条。碑额正面有6个阳刻方框,长宽约为0.26米,框中阳刻《皇帝南巡之颂》,字为篆体。碑身宽约1.37米,厚度约0.29米,高度因残缺难以测量。如以宽高之比为1:3计,则碑身高至少在4米以上。加上碑额、龟座,通高约5米以上。座为龟形,从头至尾,长2.05米,宽1.37米,高0.53米。龟连为一体,四周光滑,未刻纹饰。

目前所见《南巡碑》残碑共10块,均遭到严重风化和磨损。碑身阴、阳两面俱阴刻文字,两侧平整光滑,无文字。拼合后,经反复辨识,最终使该碑可识文字达到2500余字。其中碑阳170余字,碑阴2400余字。碑阳之文,主要是通过文成帝南巡归途中与从臣比射一事而歌颂当时社会稳定,民安政清,怀集周边的大好形势。碑阴之文,皆为从臣的官爵姓名。两面文字,均为魏体。

有关北魏皇帝出巡或御射之碑,著录得不少,但现存的唯此一通,是山西现存最早的魏碑。由于该碑文涉北魏最高统治集团,因而这块碑也是关于北魏早期政治、官爵、姓氏诸方面信息量贮存最多最集中的一块碑,能从多方面补史载之阙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尤其是碑阴残存的280余位从臣的官爵姓名,是研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的珍贵史料。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,早期官制已不见史载,即使有也是零星记载。此碑中的资料可补此缺憾,保留着多种史乘及金石碑碣中从未见过的职官,如内行内三郎、折纥真、斛洛真、斛洛真军将、雅乐真幢将、贺浑吐略渥、内小幢将、三郎幢将等,皆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。此外,碑文中大量出现的内阿干、羽真、内行令、内行内小、内三郎等拓跋官号,对进一步探研其职掌及相互关系也很有意义。碑中还存有许多汉族传统官号,有文官也有武官,仅尚书就见16人,这对探讨北魏官制的源流、职数、特点等也极有价值。碑中还见有许多爵位和鲜卑族姓氏,如姓氏中的代优云、社利、挟库、比子、胡优、热阿、其连、胡比、契胡、盖毛、敕烦、奚斗、立刹诸姓,均为历代记载所不见,都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。